

冷战初期越共结盟政策的缘起与形成(1947—1950)

乌力吉

内容提要 冷战初期,越南共产党试图延续其自建国以来带有中立色彩的对外政策,极力避免法越战争国际化。但在冷战向亚洲蔓延、法越战争进入僵持阶段、中国革命形势快速发展、美法关系升温等因素的作用下,越共逐步走上了结盟之路。1950年初,越共追随中共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标志着其结盟政策的形成。该政策不仅导致越共获得了足以改变战场形势的军事援助,并促成了以中国支援越南进行民族解放斗争为主要形式的中越准军事同盟。更重要的是,越共借社会主义阵营的外交承认解决了法国选择扶植保大政府所引发的政权合法性危机,这也是越共实施结盟政策的直接动因。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越南 法越战争 越南共产党 结盟政策 中越关系 冷战

1950年1月1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布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

* 乌力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后。(邮编 100871)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东亚冷战与中国对外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7ASS006)阶段性成果。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系,中苏两国政府分别于1月18日、30日承认其政权。中越建交及中苏两国对越外交承认,标志着越南共产党^①彻底放弃1945年建国时确立的“避免越南问题国际化”的外交方针,^②走上一条追随中国共产党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结盟之路,旗帜鲜明地站在反帝斗争的第一线。

越共为何放弃先前带有中立色彩的对外政策转而与中苏结盟?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较为有限。从逻辑上讲,越共作为信奉马列主义的政党倒向苏联阵营有其必然性。^③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越共领导人胡志明及其领导的党长期不受斯大林信任,中南半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边缘地带。^④因而越共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建立外交联系的具体过程仍然值得研究。此外,尽管已有学者通过对中国援越抗法政策的研究指出该政策背后中共领导人支援东亚革命、推广中国革命经验的动因,但这一外部因素是如何影响越共政策的,或者越共又是如何利用这一因素的,学界缺乏以越方为视角的专门研究。

关于越共向中共求援的动机问题,学者往往只强调法越战争的力量对比,认为越共如果不北上求援则很难继续进行抗法战争。^⑤但是,不论从法越双方当时对战场形势的研判,还是后来史学界的研究几乎都认为,法国对越共军队

① 越南共产党指以胡志明为核心的越南无产阶级政党,成立于1930年2月,同年10月改称印度支那共产党。1945年11月,印支共因抗法斗争需要转入地下,并以1941年5月成立的民族统一战线组织——越南独立同盟会(简称越盟,1951年3月并入越南国民联合战线)的身份公开活动。1951年2月,越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公开党的活动,改称越南劳动党。1976年12月,越南劳动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改回越南共产党。因此,越共、印支共、越盟、越南劳动党没有本质区别,特此说明。

② [越]刘文利:《越南外交50年(1945—1995)》,上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翻译中心译,河内:越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19页;Mari Olsen, *Soviet-Vietnam Relations and the Role of China, 1949-64: Changing Allianc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2; Ilya V. Gaiduk, *Confronting Vietnam: 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Indochina Conflict, 1954-1963*,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2, pp. 3-4.

③ 越南官方出版的外交史著作大多简单记叙了1950年初越南获得苏联阵营外交承认的具体日期,仅突出其“外交胜利”的意义和越共作为马列主义党的正统性,关于越共对外政策调整的动因并未加以分析。比较有代表性著作有:[越]武阳宁:《越南对外关系史1940—2000》,河内:国家政治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Vũ Dương Ninh, *Lịch sử quan hệ đối ngoại Việt Nam 1940-2010*,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chính trị quốc gia-sử thật, 2014);[越]阮廷宾主编:《越南外交1945—2000》,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2002年版(Nguyễn Đình Bin (chủ biên), *Ngoại giao Việt Nam 1945—2000*,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2002)。

④ 沈志华:《毛泽东与东方情报局:亚洲革命领导权的转移》,《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第35页;Ilya V. Gaiduk, *Confronting Vietnam: 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Indochina Conflict, 1954-1963*, pp. 2-3.

⑤ 高嘉懿:《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与冷战:中国的援越抗法与美国的援法反共》,《军事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87页;郭明主编:《中越关系演变四十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7页。

的装备优势并不能掩盖其兵力不足的缺陷,因而1949年初双方实则处于某种“战略平衡”状态。^① 尽管有学者指出越共对中共求援动机除“军事援助”外还有获得其“外交承认”的目的。^② 那么,为何越共在1950年左右而不是在其他时间发起结盟外交? 究竟越共的结盟政策是如何酝酿和形成的?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以越共为视角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本文拟利用中、越、美、俄等多方解密档案和其他文献,探讨1947年至1950年越共结盟政策形成的背景、动力及其主要影响。

一、法越战争爆发前的越共对外政策 (1945年8月—1946年12月)

1945年8月,越共抓住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时机发动起义,在河内宣布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新生政权彼时处于各国政治势力的夹缝之中:越南北方除日军外,还有入越受降的20万中国国民党军队及其支持下的越南国民党、越南革命同盟会的势力;法国远征军则在英国帮助下重返越南,控制了南圻、中圻南部。由此,越共在8月15日新潮召开的全国会议上确定了“避免越南问题国际化、集中力量开展对法外交谋求越南独立与统一”的外交方针。^③

在上述方针指导下,越共先是主动邀请受中国国民党控制的越南国民党和越南革命同盟会参加国会,之后三方经多次协商于1946年元旦组建了以胡志明为首的临时联合政府。与此同时,新政府就越南独立与统一问题积极开展同法国的谈判。为最大程度避免越南问题国际化,越方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同意由1.5万法军接替国军进驻北方,中方军队须在3月30日前撤出越南。^④

① 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昆明军区司令部二部1983年版,第332—340页;〔美〕道格拉斯·派克:《越南人民军》,张强等译,昆明:云南省军区政治部联络处1986年版,第34页;Martin Windrow, illustrated by Mike Chappell, *The French Indochina War 1946-54*, New York: Osprey, 1998, pp. 11-15.

② 牛军:《中国援越抗法政策再探讨》,《外交评论》2010年第3期,第56—73页;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2》,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152页;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01, pp. 119-144; Qiang Zhai,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s, 1950-1975*, Chapel Hill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p. 42-49.

③ 〔越〕刘文利:《越南外交50年(1945—1995)》,上册,第18—19页;Mari Olsen, *Soviet-Vietnam Relations and the Role of China, 1949-64: Changing Allianc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p. 2; Ilya V. Gaiduk, *Confronting Vietnam: 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Indochina Conflict, 1954-1963*, pp. 3-4.

④ 〔越〕刘文利:《越南外交50年(1945—1995)》,上册,第34—35页。

越共中央于3月9日发出“以和为进”的工作指示,要求越方武装力量在中国军队完全撤出越南前,尽量避免与法国发生军事冲突。^①虽然越共无力阻止法军重返越南,但通过这段时间的外交努力在越南国内形成了一个由越共主导的反殖民主义的统一战线,并为法越“大叻会议”和“枫丹白露会议”创造了较为缓和的谈判环境。

1946年9月,由于法越双方迟迟无法在南圻地位问题上达成一致,枫丹白露会议宣布休会至来年1月。10月中旬,法属印支联邦总督阿让利厄(Georges Thierry d'Argenlieu)和法国印支远征军司令部共同决定对越南北方采取强硬措施。法军于1946年11月10、20日分别进占谅山、海防,同那里的越南军队发生军事冲突。12月19日晚8时,双方的军事摩擦终于在河内演变为一场大规模巷战。^②1947年初,战火燃遍越南,第一次印支战争爆发。^③很快,越共主力约三万人便因力量对比悬殊而不得不撤出河内、海防等大城市,退到越北的丛林地区“保全主力、持久抗战”,同时在其他地区组织民兵发动游击战争。^④尽管山林密布、人烟稀少的地理环境给法军的军事清剿带来不小的困难,但同时越军也因耕地不足、脱离城市而缺乏足够的粮食、武器等物资,短期难以实现打败法国殖民者的目标。可以说,能否得到国际援助开始成为越共生死攸关的战略问题。

二、中共:潜在同盟军(1947年—1949年1月)

从1947年开始,越共中央明显加强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关注,并逐步接受和运用中共的战略思想与话语体系来指导抗法斗争。1947年9月23日,越共总书记长征将其自1947年2月以来在《真理报》上连续刊载的11期文章经

① 《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和谈是为了进攻的指示》,1946年3月9日,《越南共产党文献全集》,第8册,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2000年版,第48—56页(“Chỉ thị của Ban Thường vụ Trung ương hòa để tiến,” 9-3-1946, *Văn kiện Đảng toàn tập*, tập 8,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2000, tr. 48-56)。

② Stein Tønnesson, *Vietnam 1946: How the War Began*,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pp. 195-198.

③ 关于第一次印支战争的爆发时间有不同说法,另外一种观点是以1945年9月23日西贡当地反法力量同法国占领军爆发流血冲突为始。参见〔美〕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战争的余烬: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灭亡及美国对越南的干预》,上册,詹涓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51、218页。

④ 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218页;Martin Windrow, *The Last Valley: Dien Bien Phu and the French Defeat in Vietnam*, Cambridge, MA: Da Capo Press, 2004, p. 93; Martin Windrow, illustrated by Mike Chappell, *The French Indochina War 1946-54*, pp. 11-22.

过补充,编撰成《抗战一定胜利》一书,在全越发行。^①书中讲,“从毛泽东战略(防御、相持、反攻)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时机是无法提前预知的,它取决于革命军的相对力量、在民众所获得的支持度以及敌军士气的消沉程度”。长征还着重指出“国际势力”——具体而言主要是美国、苏联和中国——对越南革命获得成功的重要性,不过,他还是强调法国舆论最终将起到决定性作用。^②

一年后,长征又为越共中央起草了名为《我们为独立和民主而战》的文件,并在1948年8月8—16日的第五次中央干部会议上进行集体学习和传达。该文明确提出越南革命的性质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任务要“齐头并进”。^③如此提法是毛泽东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的首创,该理论所强调的“共产党的领导权”“抗战与革命是一个东西、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同时发生”“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等,这同长征的文件有不少相似之处。^④

不难想象,越共高层早年与中共高层联系的经历成为中共战略思想在越党内传播的一个重要历史渊源。例如,胡志明曾在巴黎结识勤工俭学的周恩来等中国留学生,后又在大革命时期担任过苏联顾问的翻译;范文同、武元甲曾于1939—1940年被派往延安接受军事训练;长征原名邓春区,因崇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改名。^⑤更重要的是,越共与中共于1947年春建立了无线电联系。尽管双方信息沟通不太顺畅,但毛泽东在当年年底的中共中央扩大会上指出,“将来我们打到两广时,援助他们”。^⑥这表明,毛泽东已经萌生了未来支援越南反殖斗争的想法,并大致提出了中共向越共提供援助的条件和前景。

可见,能够促使中越两党走向联合的基本条件还在于法越、国共两个战场

① 这些文章是为解释越共抗战路线而作,包括:《我们打谁》《为何而战》《我们抗战的性质》《我们的困难和法国的困难》等。参见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196页。

② William J. Duiker, *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6, p. 135.

③ 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261—262页。

④ 关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观的产生过程参见杨奎松:《毛泽东为何放弃新民主主义:俄国模式影响下的中国“新民主主义”观》,载杨奎松:《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7—306页。

⑤ 参见胡志明:《中国革命与越南革命: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四十周年而作》,《人民日报》1961年7月3日,第10版;〔美〕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战争的余烬》,上册,第201—202页;中共对外联络部二局编:《越南人物资料》(内部出版),1986年版,第2、36—37、158—159页。

⑥ 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的谈话》,1947年12月,载王晔星编:《毛泽东思想万岁》(内部资料),第二卷,1967年版,第100页。

的形势发展,这也是越共主动争取中共援助的现实动力。1947年10月7日,法军发动了名为“李作战行动”的针对越盟总部的伞兵突袭,越军总司令武元甲很快集结部队围攻空降的法军,双方各有伤亡。据法方统计,越军损失了大约9000名士兵,几乎相当于其正规军的三分之一。^①接下来的三个月,法国的其他军事行动也都未达到预期效果。这样,越军在付出大量伤亡后挫败了法军“一举摧毁越盟”的军事计划,越方称这次战役为“越北大捷”,“抗战”由此进入“敌我激烈斗争”的阶段。^②法军方也做出类似判断,即“战争长期化不可避免”。^③1948年1月15日,越共中央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加强对战争的指导”,将原来全越15个战区整合成6大联区,并提出“用法军的枪打击法军”“发展民兵”的任务。^④法越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消耗战需要更多兵员、粮食和武器弹药,这为越共的装备水平、后勤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获得外援就变得更加急迫了。

随着中共在国共内战中逐步占据优势,中国革命获得胜利的前景令越共领导人认识到抗法斗争的转折正在到来。1948年9月12日开始的锦州会战拉开了中共三大战役的序幕。1949年1月,尘埃落定,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军事力量被歼灭。

1949年1月14—18日,越共中央于召开第六次干部会议,长征做了题为《关于准备总反攻》的报告,正式提出了“积极迎共”的方针。他说,“中国新民主主义的运动将波及印度支那边界……绝对不应错过这个战略机会”,并告诉他的同志们,“我们邻邦国家的革命运动是我们的直接盟友。中国革命即是我们革命的胜利。而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胜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军事方面,要求着重加强“主力部队”建设以“适应即将到来的运动战”。^⑤以上这些言论,不仅表明越共由于受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鼓舞,产生了推进战争进程的动力,还预示着获得中国援助以扭转抗法斗争形势的可能性大幅提高。比起通

① [美]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战争的余烬》,上册,第268—270页。

② 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258页。

③ [美]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战争的余烬》,上册,第270页。

④ 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260页。

⑤ 《长征同志在中央干部第六次会议上关于准备总反攻的报告》,1949年1月14—18日,《越南共产党文献全集》,第10册,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2001年版,第25—67页(“Tích cực cầm cự và chuẩn bị Tổng phản công—Báo cáo của đồng chí Trường Chinh tại Hội nghị cán bộ Trung ương lần thứ sáu,” 14/18-1-1949, *Văn kiện Đảng toàn tập*, tập 10,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2001, tr. 25-67);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285—286页。

过法国共产党而影响法国政坛使之撤军的政治外交攻势,得到外援、打赢战争的路径显然更加直接和实际。

但此时战场形势的发展并没有迅速使越共得到中方的大规模援助,中越两党也没有立即建立后来那种密切的关系。那么,应如何“积极迎共”,进而实现获得援助、打赢法国殖民者的目标,则取决于越共在国际冷战的大背景下对所谓“战略机会”的认识与把握。

三、“积极迎共”背后的战略考量

(1949年1月—1949年11月)

越共中央尽管在第六次干部会议上根据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前景提出了“积极迎共”的方针,但在1949年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越两党关系并未有实质性发展,直到1949年10月越共才派了两个低级别的代表李碧山、阮德瑞到北京,^①提出“重建两党联系”并希望得到中方援助,显得并不特别急切。这固然有前文提到的中国战场形势的原因,^②但通过越共的一些行为推断,越方决策层对于推动中越结盟另有顾虑。

从逻辑上讲,美苏冷战向亚洲蔓延的趋势不能不使越共中央思考同中共接近的后果,以及得到其援助的代价是什么——倒向社会主义阵营会不会引来美国的干涉?一旦成为苏联阵营的一分子,是否会像中越历史上那样再次成为北方国家的附庸?有没有一种既能得到援助又无须选边站队的方式呢?如果说越共领导人可能不知道1949年2月米高扬访华与1949年6月下旬刘少奇访苏这样的中苏高层互动的细节,但毛泽东在1949年6月30日发表《人民民主专政》,公开宣布中共“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后,他们可能明白一旦中越接近,日后的对华关系恐怕要在中苏社会主义同盟的权力框架里思考,这不一定是有益的。

例如,在1948年8月,越共中央集体学习和传达题为《我们为独立和民主而战》的文件时,长征等越共高层只提到“中国革命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有很大

^① 李碧山即李班,时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华侨司司长、印支共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阮德瑞,印支共党员,精通华语,当时对外身份是商人。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04页。

^② 与越南接壤的广西、云南两省分别于1949年12月、1950年2月解放。参见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第五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7—422、486—488页。

影响”，重点还是放在分析法国的形势及法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上，说这一运动“捆住了法殖民主义者的手脚”。最后笼统指出，世界革命运动对一个国家的革命影响是“不小的”，要做好迎接抗战“大好时机”的准备。^①虽然没有看到越共高层关于上述问题的具体讨论，但可以通过他们当时的一些言论推测出越共中央战略谋划的关节所在及围绕它们产生的讨论甚至分歧。

首先，对美国介入越南的担忧。尽管长征在1949年1月干部会议上热情讴歌中国革命的伟大意义，宣传“积极迎共”方针，但他也说道，“中国解放军所取得的胜利可能会给越南人民带来新的困难。不可忘记美国目前仍然帮助蒋介石政府，所以其可能直接干涉越法战争，从而阻碍中国解放军在华南的进攻步伐，或是把越南变成根据地用来抗击中国解放军，进一步帮助法国，使其与蒋的残留力量联手共同抵抗中国革命。”^②长征设想的美国“干涉越法战争”“把越南变成根据地”的可能性，并非基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显然是他对现实主义权力逻辑的自发运用。这说明越共作为弱势一方，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自身没有获得实际援助前不能公开选边站队，避免让自己成为大国对抗的“炮灰”。

其次，如何将中国革命的胜利转化为越共抗法斗争的红利，是越共中央战略谋划的难点所在。理想的策略是一面尽量树立民族主义者的形象，避免或推迟美国介入法越战争的时间，一面秘密联络中共、培育两党友谊以求得实际援助。早在1948年6月，胡志明便指示越共的党内干部不要公开批评美国，宣布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对美政策是“既没有反对它们的意愿，也不以任何方式招致其敌意”。^③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越共也的确没有公开批评过美国。直到1949年5月，越共在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时依然非常谨慎，

① 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261页。

② 《长征同志在中央干部第六次会议上关于准备总反攻的报告》，1949年1月14—18日，《越南共产党文献全集》，第10册，第25—67页（“Tích cực cầm cự và chuẩn bị Tổng phản công—Báo cáo của đồng chí Trường Chinh tại Hội nghị cán bộ Trung ương lần thứ sáu,” 14/18-1-1949, *Văn kiện Đảng toàn tập*, tập 10, tr. 25-67）。

③ Commissaire de La Zone VIII à L'autodéfense: La question de notre comportement à l'égard de l'Impérialisme américain,” signed Nguyễn Thanh, dated January 14, 1948, box 91, Etats-Associés, MAE. In June 1948, Ung Văn Khiêm, Commissaire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Nam Bộ, criticized two anti-American articles, quoted from Christopher E. Goscha, “Courting Diplomatic Disaster? The Difficult Integration of Vietnam into the Internationalist Communist Movement (1945-1950),”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Vol.1, No.1-2 (February/August 2006), p. 83.

“我们只需客观地指出中国民主力量的有利消息和国民党分子的不利消息”，“不要表明我们的正式态度”。^① 11月15日，胡志明在发给毛泽东祝贺新中国成立的简短电文中，只强调中越有千年民族“友谊”，就连反殖斗争这样的口号都只字未提。^② 此外，从当时越共军队沿用建国时的民族主义番号——“卫国军(团)”，也能看出越共决策层试图避免卷入冷战、使反殖斗争复杂化的考虑。^③

事实上，越共并未放松向中共求援的努力，并积极开展与中共两广、云南地方部队的协调与合作。1948年9月17日，即锦州会战开始的第五天，中方便收到来自越共政治局要求提供援助的电报，包括三个方面的请求：一是希望中方提供包括100万美元现金、各式枪炮、无线电台，以及培养领导干部、军事技术人员的援助；二是对在中越边境活动的广东部队做出指示，让他们在需要时服从越共的命令；三是请中方牵头建立类似“东亚信息局”的机构以便得到苏联以及兄弟党派的帮助。^④ 中共方面于10月16日电复越方，除提供50万美元资金援助、同意在印支活动的广东部队在必要时听从越共命令外，武器等其他援助由于存在“技术困难”无法满足。此外，“类似情报局这样的机构的时机还不成熟”，目前首先应建立“共同战斗的联系”。^⑤ 尽管此时越共没有获得援助，但从双方比较务实的信息沟通可以看出，中共有较强的援越意愿及双方走向联合的前景。

① 《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宣传中国解放军在华南战场取得胜利的工作指示》，1949年5月12日，《越南共产党文献全集》，第10册，第217页（“Chị thị của Ban Thường vụ Trung ương Ngày 12 tháng 5 năm 1949 về công tác tuyên truyền của ta sau những thắng lợi lớn của Quân giải phóng Trung Hoa ở Hoa Nam.” 12-5-1949, *Văn kiện Đảng toàn tập*, tập 10, tr. 217）。

②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电毛主席致贺 毛主席复电致谢》，《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6日，第1版。

③ 1945年9月2日，根据胡志明“整顿、扩大越南解放军”的指示，越共将“卫国军(团)”作为其武装力量的番号。1946年5月22日，胡志明签署第71号命令将“卫国军(团)”统一整编为“越南民主共和国国家军队”。直到1951年2月11日至19日的越劳党二大上，“卫国军(团)”才更名为“人民军”。参见〔越〕胡志明：《关于武装斗争和人民武装力量》，河内：人民军出版社1970年版，第152—153页；成都军区司令部情报部编：《越南军事大事记》，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3页；〔越〕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138、177、332页。

④ 《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关于印度支那共产党的援助请求》，1948年9月22日，沈志华、崔海智主编：《中苏关系俄国最新解密档案（第一卷）》（1943.5—1949.10），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资料中心藏，2019年6月版，未刊，第135—136页。

⑤ 《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给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复电》，1948年10月16日，沈志华、崔海智主编：《中苏关系俄国最新解密档案》（第一卷）（1943.5—1949.10），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资料中心藏，2019年6月版，未刊，第143—145页。

1949年5月,“渡江战役”基本胜利,“打到两广、获得中共援助”的前景正在成为现实,越共认为这将“为越南总反攻带来更多有利条件”,并迅速发出了“宣传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华南战场取得胜利”的指示。^①随后,中越边境的联合军事行动率先开始。根据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左江支队司令员莫一凡回忆,^②越方为配合中共地方部队围剿桂系国军,胡志明于1949年6月派越南卫国团高平中团配合其部全歼龙州守军。^③

总的来看,越共这段时间的“积极迎共”政策,既有主动与中共加强联系、积极求援的行动,也能反映出越共尝试避免过早地卷入冷战、使反殖斗争复杂化的考虑,这实质是法越战争前越共“避免越南问题国际化”对外政策的某种延续。但同样从1949年开始,在日趋激烈的冷战背景下,法美关系、越南国内政局出现的新变化令越共不得不尽快实施结盟行动。

尽管越共小心翼翼,甚至在1947年春夏徒劳无功地尝试打开对美外交,^④但事实证明,越共远不能左右冷战初期美国对亚洲宏观政策的出台及其印支政策的嬗变。仅从影响美国对外政策的外部力量看,越共的对手——法国所拥有的外交资源及本身对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性是越共远不能及的。战时罗斯福政府倡导的《大西洋宪章》一系列原则是反法西斯战争正义性的来源。其设计者罗斯福总统打算将其中的民族自决作为战后世界普遍遵循的原则,反对英法继续保有殖民地,并设立联合国的托管机构作为制度保障,使印度支那非殖民化。而战后世界政治的冷战化令杜鲁门政府不会为了追求价值准则而去公然挑战一个对世界秩序举足轻重的欧洲盟国。1945年10月5日,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做出的反应是,“美国无意反对法国重新控制印度支那,美国政府没有怀疑或否定法国对印度支那统治的正当性”。^⑤尽管美国并未对

① 《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宣传中国解放军在华南战场取得胜利的工作指示》,1949年5月12日,《越南共产党文献全集》,第10册,第215—217页(“Chỉ thị của Ban Thường vụ Trung ương Ngày 12 tháng 5 năm 1949 về công tác tuyên truyền của ta sau những thắng lợi lớn của Quân giải phóng Trung Hoa ở Hoa Nam,” 12-5-1949, *Văn kiện Đảng toàn tập*, tập 10, tr. 215-217)。

② 莫一凡即陆华,解放战争时期系左江支队司令员,1943—1944年冬天,曾协助越盟举办了六期军训班。参见隆李奎:《莫一凡与越南人民解放军的成立》,《军事历史》1991年第6期,第38—39页。

③ 莫一凡:《回忆同胡主席在一起的日子》,载广西社会科学院印度支那研究所编:《印度支那研究》第五期,1980年6月,第8页。

④ 〔美〕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战争的余烬》,上册,第260—262页。

⑤ Gareth Porter, ed., *Vietnam: A History in Documents*, Vol.1,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81, p. 38.

法国在印支的军事行动进行直接援助,采取了“不干涉”的态度,但这对越共是不利的,因为敌我双方实力的差距直接决定了战争的基本态势。随着冷战在全球的发酵,“遏制苏联扩张”成为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中之重,处理殖民地问题要服从前者。法国人正是利用美国外交中的轻重缓急,“向越南输送冷战”,^①将胡志明宣传成苏联的附庸,力求得到美国的援助从而节约战争成本。

法美接近及美国对保大政府的外交承认直接使胡志明等越共领导人认识到,在冷战向亚洲蔓延的大背景下,“骑墙”是不行的。因为此问题不仅影响到胡志明政权的合法性,而且预示着美国对法开展援助的前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陷入对法持久战,越共未必会取胜。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越共抓住日本投降的权力真空期,领导“八月革命”在河内宣布建立越南第一个独立共和国。它之所以受到人民拥护,在于其高举“民族独立与国家统一”的旗帜。法国在1948至1949年开始实施“越南人打越南人”的策略——选择并扶植保大皇帝组织一个新政府,并适度给予其自治权利。1949年3月8日,法国与保大签订《爱丽舍协定》(Elysee Agreement),法国在政治上做出一定让步,“承认越南的独立并保证在民意调查后承认越南的统一”。^②这样以保大皇帝为元首的越南国,在法理上完成了三圻统一的步骤,并开始与胡志明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争夺正统地位,由此国际承认问题便凸显出来。与“保大方案”同步进行的是法国积极的对美外交游说,美国驻法大使馆自1949年春夏起不断向国务院提交政策报告建议美国承认保大政权以及公开援助法国。^③1949年8至9月间,在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共夺取政权的背景下,全面支持法国保守派的声音逐渐在美政坛占据上风,对法军实施援助只是时间问题。

与此同时,美国为适应冷战在亚洲的新局势,正酝酿一个“一揽子”的亚洲政策。1950年6月开始起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表示:“共产党在中国的权力不断蔓延,这意味着我们在政治上的惨败……如果东南亚也被共产主义横扫,我们遭遇的这次政治溃败将在全球各地带来反响……现在形势已经十分明了:东南亚是克里姆林宫所直接主导的协同攻势的靶子。”对于法属印度支那,应采取行动,“消除保大等非共产主义领导人取得越南人支持

① 〔美〕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战争的余烬》,上册,第304页。

② 〔越〕刘文利:《越南外交50年(1945—1995)》,上册,第80页。

③ Mike Gravel, ed., *The Pentagon Papers: The Defense Department History of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Vol.1, pp. 61-63.

的障碍”。^① 此报告虽然到1950年12月30日才被杜鲁门正式批准,但就对越政策而言,美国已经按照上述思路在执行了。这表明,美国“在具体政策上,反共产主义压倒了反殖民主义”。^② 1950年2月7日,美国务卿艾奇逊宣布承认越南国,随后西方阵营也相继承认。^③ 5月1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对“印度支那联合邦”总计233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④ 至此,美国终归完全站到了越共的对立面上。

四、“一边倒”:成为反帝前哨 (1949年12月—1950年3月)

越共领导人在战争一开始便小心翼翼地避免在美苏之间选边站队,力求不要让越南成为大国对抗的砧板。然而,随着印支半岛的冷战化程度日益加深,越共不仅需要接受“非杨即墨”的冷战思维,而且不得不提前回答“建什么国”的问题。在寻求援助、赢得战争的内部需求与中国推广革命经验的外部影响下,越共仅在1949年12月中旬至1950年2月初这段时间内便确立了结盟政策,并同中共一道倒向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反帝的身份框定了冷战期间越共对外政策的逻辑前提,正如越共中央在1950年2月9日的指示中所宣称的,“我国是东南亚抗击帝国主义的民主防线中的前哨。”^⑤

如前所述,美国亚洲政策出台同法国对越军事、外交压力叠加在一起,逼迫越共决策层要尽快做出反应,加速实现中越高层会晤,解决国际承认和援助问题。应该说越方对局势的反应十分敏感,行动也是迅速的。根据中越往来电报推断,越共中央应该在1949年12月15日前后形成了密切同中共关系的

①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by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30 December, 1949,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9, Vol.VII, *The Far East and Australasia*, Part 2, pp. 1215-1221; *The Pentagon Papers: The Defense Department History of Decisionmaking on Vietnam*, Vol.1, p. 82.

② 资中筠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09页。

③ 〔美〕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战争的余烬》,上册,第304页。

④ George C.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 New York: McGraw-Hill, 2002, p. 25.

⑤ 《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苏联、中国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承认我政府的指示》,1950年2月9日,《越南共产党文献全集》,第11册,河内:国家政治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Chỉ thị của Ban Thường vụ Trung ương về việc Liên Xô, Trung Hoa và các nước dân chủ nhân dân thừa nhận Chính phủ ta,” 9-2-1950, *Văn kiện Đảng toàn tập*, tập 11,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Chính trị quốc gia, 2001, tr. 225)。

决策,因为正是在这天越方向中方发电说“派往中国的代表团已准备好”,并于28日再发电报讲此代表团“有全权解决中越两党间的问题”,以回应中方四天前提出的派遣“政治上负责”的代表团的要求。从1949年12月24日的电文看,“中越两党间的问题”在中方看来主要有两个:一是“建立经常性的联系”;二是“反对帝国主义共同斗争”。^①前者所涉问题相当实际,也的确是中越关系未有大进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到1949年底,在广西、云南进行追击作战的二野、四野,以及在中越边境活动的地方纵队经常需要和越共的地方部队协调军事行动,越方趁此机会曾向中方提出过援助要求,但由于信息不畅,“一事来往磋商需十余日”,^②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双方的沟通效率和对越援助工作的开展。其实,中方对援越的态度是比较积极的,12月12日,刘少奇指示林彪,要他摸清边境情况,给越共酌情提供少量物资。^③但在不了解越共具体处境的前提下,对在京两位越共代表所要求的装备、物资、现款,表示“不能完全满足”,并于25日向越共发电说“拟派一代表,携带电台和你们接洽”。^④这一问题直到中方联络代表罗贵波于1950年3月上旬抵达越盟总部时才彻底解决。

如果说中越间联系的时断时续存在交通通讯不便、战场形势复杂等非主观因素,那么,后者所谓“反帝斗争”问题则并非空穴来风。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在1949年12月24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谈到“越共缺点问题待胡志明的负责代表来北京后再依实情酌量提出”,^⑤“缺点”应指的是1945年11月解散印支共和长期以来在“世界阵线中取中立态度”,即重点是反美不坚决。但是,中共中央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认为胡志明是真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缺点只是越共斗争的策略问题,非原则问题。^⑥这种“越共是真革命”的判断基本上确定了今后对越援助的合法性,也为中越关系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① 刘少奇:《中共中央关于接待印度支那中央代表团问题的电报》,1949年12月2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29—230页。

② 刘少奇:《关于援助越南军火物资问题的电报》,1950年1月11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315页。

③ 刘少奇:《军委关于援助越南问题给林彪等的电报》,1949年12月12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03页。

④ 刘少奇:《中共中央关于拟派代表赴越南问题给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的电报》,1949年12月25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31页。

⑤ 刘少奇:《关于云南军情和援助越南问题给毛泽东的电报》,1949年12月24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28页。

⑥ 刘少奇:《关于胡志明访问中国和苏联的电报》,1950年1月、2月,《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422—423、425页。

根据1949年12月也就是越共代表团出发前中共向越共中央反馈的信息,还是可以令越方做出如下判断:一是如中共多次表态的那样,提供军事援助可能性极大,只是目前需要向中方说清具体“需要何种帮助以及可以运输与实现的数目”;^①二是中国同意与之建交,而且为其描述了获得苏东国家承认的前景;^②三是有必要向中共澄清越南革命中不得已而为之的种种做法,方便向苏联方面进行解释。于是,越共中央很有针对性地选择了代表团成员。其中陈登宁是中央委员,负责越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可以将战争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准确表达给中方;胡志明作为越共领袖则肩负着此次出访难度最大的任务——争取苏东国家的承认和对其共产党正统性的认可甚至是公开援助。

胡志明对于苏联一直以来对印度支那地区缺乏重视的态度和斯大林对越共的偏见有一定了解。早在1947年9月,胡志明曾派特使范玉石到瑞士,向苏联大使提出访问莫斯科的要求,但最后并未得到回应。^③当时,斯大林并不想因支持越南而损害苏法关系,进而危及法共在议会和政府中的地位。斯大林本人也并不信任胡志明和越共。法共总书记多列士(Maurice Thorez)曾对他的匈牙利同志说,“斯大林多少有些不信任胡志明和他的组织”,胡志明此前曾与英美情报机构有联系,采取像解散印度支那共产党这样的行动之前也不征求斯大林的意见。^④因而,斯大林等苏共高层普遍认为越共并非马列主义政党,1949年1月末,米高扬访华时所谈到的“亚洲工人党情报局”,计划只包含中、朝、日三国,并没有越共。^⑤由此,胡志明必须在苏联人面前树立国际主义者的形象,而不是令斯大林厌恶的那种铁托式的民族主义者。

结合中越双方的相关文献,胡志明代表团一行六人于1950年1月2日从

① 刘少奇:《关于援助越南军火物资问题的电报》,1950年1月11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315页。

② 刘少奇:《中共中央关于中越建立外交关系问题的电报和批语》,1949年12月28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241页。

③ Christopher E. Goscha, “Courting Diplomatic Disaster? The Difficult Integration of Vietnam into the Internationalist Communist Movement (1945-1950),” *Journal of Vietnamese Studies*, Vol.1, No.1-2 (February/August 2006), pp. 66-69.

④ Ilya V. Gaiduk, *Confronting Vietnam: Soviet Policy toward the Indochina Conflict, 1954-1963*, pp. 2-3.

⑤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当前的工作方针》,1949年1月31日,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中苏关系》,第一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375—380页。

越盟总部秘密出发,辗转步行17天才从越南福和县穿越边境,于19日抵达中国的龙州水口街。当地军分区的主要领导见到了胡,并派专车送其到南宁。25日,胡抵达中共中南局驻地武汉,这时,刘少奇才知道越方来的人是越党主席。胡志明一行于30日傍晚到达北京,整个过程都是秘密的。抵京当晚胡志明同刘少奇等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进行会谈。双方很快就各自关心的问题得到满意的答案:越共要求援助的,除飞机外,中共均给以“满意答复”;中共通过胡志明的解释印证了先前的判断,即越共没有思想原则问题,胡志明是革命领袖。^①

胡志明抵达武汉、与刘少奇取得直接联系后不久,便马上着手完成他此行的主要任务,面见斯大林获得苏联的认可与支持。1950年1月27日,胡当即通过中共电台向苏共中央发电,表示希望同意他秘密前往莫斯科面见斯大林、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毛泽东的协调下,斯大林同意了胡志明的请求并派飞机来接其赴苏,后者毅然决定于1950年2月3日动身前往莫斯科。^②在胡志明到莫斯科之前,斯大林告诉毛泽东,援助越共还是由中国担任,苏联可提供一些物资从旁协助。^③2月6日,胡志明抵达莫斯科,之后不久,他拜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基本重复了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④胡志明希望密切苏越关系,并且公开签订一个类似中苏同盟条约那样的协议。16日,斯大林设宴招待中国代表团时,他借机向斯大林提出这个要求,斯大林戏谑式地拒绝了他。^⑤胡志明此刻已经明白,援助越南主要以中国为主。同时,他也已经达到了中苏之行的基本目标——加入苏联阵营、得到中苏高层的援助承诺。

不能过分夸大胡志明参加中苏越“首脑峰会”对越共结盟政策形成的意义。其实,在胡志明离开越南前的1949年12月越共中央就已经确定了依靠中国援助、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基本方略。因为从胡志明北上开始,越共中央一

① 参见刘少奇:《关于胡志明访问中国和苏联的电报》,1950年1月、2月,《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421—426页;莫一凡:《回忆同胡主席在一起的日子》,第8—9页;〔美〕弗雷德里克·罗格瓦尔:《战争的余烬》,上册,第301页;〔越〕刘文利:《越南外交50年(1945—1995)》,上册,第88页;〔越〕中国研究中心编:《越中关系大事记(1945—1960)》(征求意见稿),河内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② 刘少奇:《关于胡志明访问中国和苏联的电报》,1950年1月、2月,《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422—426页。

③ 窦金波:《参加赴越军事顾问团纪行》,载《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当事人的回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

④ 张广华:《中国援越抗法重大决策秘录》,载《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当事人的回忆)》,第28页。

⑤ 同上书,第25页。

系列围绕、配合上述战略的实际行动便同时展开了。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胡志明应当是参与者之一。特别是在政治外交方面,越共中央从1950年1月中旬便开始推进越共对外政策的调整,并在党内开展了大规模亲中反美的宣传运动,这些举措有力地配合了胡志明对中苏的首脑外交。按照1949年12月中越双方事先沟通,越政府仿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国时发表的公告,于1950年1月14日声明:“随时准备和所有尊重越南国家的平等权利、领土主权和国家主权的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以谋求共同保卫世界的和平与民主。”^①随后,中国驻苏东国家使馆将声明文本陆续送达这些国家的外交部,为它们承认越南创造了条件。15日,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其建交。18日,中国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成为第一个承认其政权的国家。同日,越共中央指示,报纸刊载抨击美帝国主义、揭露美国军阀财阀准备直接干涉印度支那企图的文章。^②至此,越共正式改变了避免批评美国的外宣政策,并认为这是获得苏联信任的一个重要举措。

苏联于1950年1月30日宣布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东欧民主国家亦陆续在当年2月2日至11日宣布承认。越共党内随即做出决定,将追随中国的脚步在冷战中站在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长征告诉他的同志们,“在印度支那,出现矛盾冲突的不仅是我们的人民与法国殖民者,事实上更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在国际层面的冲突”,“在这场对抗由美国领导的帝国主义阵营的战争中,越南将承担自身的角色。”^③与此同时,中越双方共同拟定了一份越南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其中,明确把“与苏联、中国及其他新民主国家结成联盟”作为越共的“国际任务”。^④1950年3月26

① [越]胡志明:《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政府的声明》,1950年1月14日,《胡志明选集》,第二卷,河内: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版,第108—109页。

② 《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宣传我们政府外交政策的指示》,1950年1月18日,《越南共产党文献全集》,第11册,第16页(“Chỉ thị của Ban Thường vụ Trung ương về việc tuyên truyền chính sách ngoại giao của Chính phủ ta,” 18-1-1950, *Văn kiện Đảng toàn tập*, tập 11, tr. 16)。

③ Christopher E. Goscha, “The ‘Two Vietnams’ and the Advent of the Cold War: 1950 and Asian Shift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in Christopher E. Goscha and Christian F. Ostermann, eds., *Connecting Histories: Decolonization and the Cold War in Southeast Asia, 1945-1962*, Redwood City: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214-215.

④ 《希巴耶夫转交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关于越南问题》,1950年3月16日,沈志华、崔海智主编:《中苏关系俄国最新解密档案(第二卷)(1949.10—1960.12)》,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资料中心藏,2019年6月版,未刊,第95页。

日,斯大林电复中越方面表示赞同该草案。^①由此,随着越南被接纳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以及有关与中苏结盟的表述被写入党代会决议,越共的结盟政策正式形成。

总的来看,越共能够获得来自苏联阵营的政治支持,固然与其做出“一边倒”的外交姿态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中共在胡志明赢得苏联领导人信任方面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中共认为,援助亚洲革命,既是责任,也是自身安全的需要。正如刘少奇所说:“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②再加上先前中越互动建立起的信任关系,中共欣然担负起领导越南革命的责任。毛泽东在访苏期间不仅多次在与斯大林的交流中谈及支援亚洲革命以及越南民族解放运动,而且积极促成了胡志明访苏。斯大林在1950年1月6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明确表达了对中国担负领导越南革命的认可态度。他说,“前几天我有机会看了一些关于越南和胡志明同志的材料,他是能干的共产党人,专心致志领导自己的事业,应该得到一切可能的支持”。^③由此,中国支援亚洲革命的国际责任观以及有关中苏之间支援世界革命分工的共识,令斯大林无须再去追究胡志明是否犯过路线错误抑或他的党是否是马列主义的,因为法属印度支那并非是苏联支援世界革命的阵地。^④

五、越共结盟政策的影响

越共实施向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联盟行动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然而影响却是极其复杂和深远的。

^① 《维辛斯基给希巴耶夫转交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同意越南当前党代会的决议草案》,1950年3月26日,沈志华、崔海智主编:《中苏关系俄国最新解密档案(第二卷)(1949.10—1960.12)》,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资料中心藏,2019年6月版,未刊,第96—9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45页。

^③ 《斯大林致毛泽东函:同意向中国提供援助》,1950年1月6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俄罗斯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资料中心藏,未刊。

^④ 有关中苏支援革命的分工,参见“刘少奇记录的斯大林谈话”,载金冲及编:《刘少奇传》,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651页;师哲、李海文:《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12—414页。

首先,最直接影响在于战场形势因中国援助的到来而改变。1949年12月底,中共派遣联络代表到越南的决定意义重大,罗贵波赴越畅通了中越协调的信息渠道,将越方的需求直接反馈到中共中央,从而决定了中方援越的具体形式和内容。1950年3月,毛泽东访苏回国后不久即接到罗贵波从越南前线发回的电报,罗贵波传达了越方的具体要求:(1)在中越边境的高平、老街等地区发动一场战役,打开中越边界的交通;(2)需要向越共提供1.5万人的武器装备;(3)派遣一批从营到军级的干部前往越军担任军事顾问。中国领导人接到电报后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援越问题。^① 这次会议决定通过提供军事援助和派遣军事顾问团的方式,帮助越共打败法国殖民统治。中国的援越抗法政策由此形成。罗贵波电文中所提到的内容并非是无来由的,胡志明北上后,越共其他领导人便已经在积极准备迎接中国或中苏的援助了。为此,越共中央开始谋划打通中国援越物资入越的军事行动。1950年1月6日,越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西北战役并准备东北战场的指示”,目的之一是“解放老街省,打通国际交通线”。^② 1950年2月8日至当月末,越共投入两个主力团发动了第一次边界战役。其中,102主力团经过6昼夜激战,拔除了法军两个连驻守的老街铺楼据点。这是越军“第一次攻坚战”。^③ 由于缺乏炮兵等攻坚武器以及指挥经验不足,没有达到预期效果。1950年1月21日,印支共召开了第三次代表大会,此次大会在军事方面系统地总结了越军在作战和部队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即“缺乏正规军,缺乏攻坚和攻城的兵种及重型武器。缺乏快速通信手段,缺乏真正懂得韬略的指挥运动战的干部。”^④ 上述作战意图和反映的问题与罗贵波所转达的三个要求基本上是一致的。

从1950年4月开始到9月,越共将中国的军事援助直接用于打通“国际交通线”的军事行动中。此间越方接收中方各种枪支1.57万支,各种火炮及火箭筒500余件,以及大量弹药、粮食、药品和通讯器材,并派三个主力师进入

① 张广华:《中国援越抗法重大决策秘录》,载《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编写组:《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实录(当事人的回忆)》,第28页。

② 《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开展西北战役并准备东北战场的指示》,1950年1月6日,《越南共产党文献全集》,第11册,第7—9页(“Chỉ thị của Ban Thường vụ Trung ương về mở chiến dịch Tây Bắc và chuẩn bị chiến trường Đông Bắc,” 6-1-1950, *Văn kiện Đảng toàn tập*, tập 11, tr. 7-9)。

③ 越南社会科学院史学院编:《越南大事记(1945—1986)》,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304页。

④ 越南社会科学院史学院编:《越南大事记(1945—1986)》,第30—31页;越南总政治部军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人民军历史》,第一集,第304页。

中国边境地区接受中方军事训练和接收武器装备。^①这使得越军主力部队的军事实力大幅提升,已经与4号公路附近据点的法军的装备水平大体相当。1950年9月16日,第二次边界战役打响,在陈赓及其他中国军事顾问团成员的指导下,于10月底获得战役胜利,成功实现了打通中越交通线的作战目标。越方称这次战役“改变了敌我之间战争的局面”。^②

其次,中越两党两国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一种“同志加兄弟”“领导与被领导”的社会主义同盟被确定下来。中越双方曾作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亚洲革命党享有平等地位,但两党高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并无联系。随着中国援越抗法政策的形成和实施,中越两国关系升格为中国支援越南进行民族解放斗争的准军事同盟。该同盟关系存在三个显著特征:一是同盟结构的非对称性,这种不对称不仅是指实力的强弱之分,还存在观念的主从之别。中方作为大党大国是这一联盟的盟主与领导者,越方则是盟友与被领导者。即便如此,想象中的盟主可以任意支配盟友的情况并非常态,盟友往往利用盟主实现自身的政策目标,中越关系中经常出现“尾巴摇狗”的现象;^③二是同盟义务上的主观性。该同盟义务并非由书面协议规定,而是完全基于双方对国际主义原则的理解与阐释。当双方在具体现实利益上发生矛盾分歧时,并没有一份规范性文件可作为参照,也不存在争端调解机制。尽管中国领导人一再追求着国际主义的最高境界和最佳效果,即强调“不强加于人”“不能摆大国架子”、让越党自己学习中共的革命经验,但在特定历史时刻相对弱势的越方总会产生不信任感;^④三是以中苏同盟为基石,由于越共结盟政策是在中苏同盟,以及中苏对支援世界革命分工的框架下实现的,以后的中越关系必然会受到中苏同盟变动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是中苏同盟的蜜月期,中越关系较为稳定;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同盟走向破裂,此时的中越关系出现了如调解中苏矛盾、中苏争夺世界革命领导权等更为复杂的影响因素。

① 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

② 〔越〕中央党史研究委员会编:《越南共产党50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二局译,河内:真理出版社1982年版,第65页。

③ 冷战史学界将这种“盟友使盟主不得不按它们要求行事”的现象描述为“the tail wags the dog”或“the tail wagging the dog”,意为“尾巴摇狗”,喻指处于从属地位的势力执掌指挥或控制权。

④ 中国军事顾问团历史编写组编:《中国军事顾问团援越抗法斗争史实》,第6页。

结 语

本文研究发现,冷战初期越共的结盟政策是在一个长过程中形成的,包含着比较复杂的目标,不同目标间的轻重缓急并非一成不变,而得到军事援助并不始终是其演变的首要动力。进一步说,法国选择扶植保大政府所引发的越共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是其选择结盟外交的直接动因,合法性危机又加剧了越共获得军事胜利的迫切性。因此,获得国际承认与获得打破法越战场僵局的军事援助成为其结盟政策的核心内容。

此外,越共的“一边倒”固然可以简单看作是国际冷战向亚洲蔓延的产物,是越共应对体系压力的必然结果,但如果不对这一政策涉及的诸如法越战争局势、中国革命形势、法美关系、越南政局等不同层次复杂背景加以考察,就无法建构起完整的分析和叙事结构,进而理解冷战是如何影响越共政策的。由此,本文通过这一案例的考察也说明,即便是体系内相对弱小的行为体,体系压力也只能决定对外政策大方向,但不能决定其行为的具体细节;体系层次的影响必须通过单位层次的干预变量加以转化,因此这种影响是复杂的和间接的。